

茶具文物馆藏印考述与特色

邓民亮

1.1 研究缘起

罗桂祥博士继 1981 年捐赠首批茶具珍藏，促成茶具文物馆的建置，并于 1992 年向当年的市政局提出新的捐赠，包括 24 件珍贵瓷器和 260 方印章（见图 1），提议为茶具文物馆扩建新翼。其后，这批捐赠由原来建议的 260 方印章增至最终的 677 方（共 663 项，每项一印者 649 项、每项二印者 14 项），构成一个包含明清至近现代不同流派的印章收藏，而当中有好一部分是广东和香港印人的作品。

过去，印学研究在香港较少受关注。茶具文物馆的藏印，正为重新研究提供了良好契机。2017 年 5 月，茶具文物馆与专注岭南印学研究的年青学者刘浩敏博士组成研究团队，展开为期一年的「茶具文物馆藏印与岭南篆刻研究」计划，重构这批藏印对岭南印学发展的价值及重要性。

是次研究透过文献、档案资料的梳理和口述历史访问，重整藏印的来由，并重新发现这批藏印对岭南印学发展的价值及重要性。

1.2 文献、档案资料的重整

1992 年 6 月，罗博士写了一封信给谭志成总馆长，表达了捐赠的意愿。经过多番努力，市政局于同年 11 月接纳建议。1994 年 2 月 28 日，市政局于大会堂举行捐赠仪式，捐赠以「罗桂祥基金」的名义送出，并由当时基金主席罗太太（罗成小澄女士）代表致辞。当时公布的印章数目已增至 500 多方。比之 1992 年的初衷，增加逾倍。根据 1994 年 2 月 21 日的收据所示，茶馆在当日完成接收 570 方石印和 10 方竹印，合共 580 方的珍贵馈赠。

捐赠仪式后，罗博士仍继续购入印章赠予茶具文物馆，分别在 1994 年 4 月 25 日及 9 月 26 日，先后再捐赠 44 项和 84 项的两批印章，由于印章是连同署有「集古斋」店号的单据送来，可以清楚说明两批印章均购自集古斋，这是罗博士离世前的最后惠赠。

现任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黄燕芳馆长，当年曾在茶具文物馆任职，并亲身参与接收捐赠的过程。得其鼎力协助，把单据和相关档案数据整理出清晰的流程，并指出藏印来源的几个重要线索和脉络，即**集古斋**、**博雅公司**和**李祖佑医生**。

2.1 集古斋与杜用庭女士

为了更详细了解藏印的来源，本研究团队访问了当年任职集古斋的杜用庭女士，就是杜女士经手把印章售予罗博士。她于 1960 年代后期加入左派出版界工作，最初在学生书店任职，后来被调到专门经营内地书画文物的集古斋。之后更有机会跟潘静安（1916–2001）先生ⁱ 学篆刻，因而奠下日后经营书画篆刻的根基。

集古斋的背景是中资机构，从 1950 至 1980 年代改革开放前，内地的古书画、古籍碑帖、古董、印石等是不可以自由买卖出口的，只有集古斋等少数中资单位才获授权在香港出售这些文化用品。1970 年代初期，正值文化大革命，那时香港的三联、商务等书店根本无利可图，开设集古斋，就是要以经营书画文物的收入补贴出版事业。

2.2 1960 至 1990 年代香港的印章市场

1960 至 1970 年代，印章来源基本是由内地文物商店和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等提供。文革前后，物品源自民众变卖收藏，或者文革时期被抄家充公得来的。文革后，有些物品没人认领，过了一段时间自然收归国有，再拨入文物商店出售。当时的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也在民间设立了收购点向民众征集藏品。而集古斋的经理会大约半年一次到内地购货，主要选购书画、古籍，兼及旧石材、印章、文房四宝等。每次来货后都要请师傅打磨包浆，制作新的锦盒以便销售。其时，藏家对有刻字的印石十分有兴趣，不少篆文刻得好，欣赏价值高，而售价却十分便宜。

1970 至 1980 年代，在集古斋购买名家印章的主要买家，竟然是日本人。那些日本书道家像小林斗龠（1916–2007）和他的学生，还有青山杉雨（1912–1993）、宇野雪村（1912–1995）等书道家，特意来港搜购名家刻印，所以有不少名家篆印流往日本。ⁱⁱ

1990 年代以前，集古斋一直未有举办过印石展览，只在门市部的陈列柜展示各式旧石章和印材。直至 1990 年代开始转以展览形式，1993 年 3 月的「名家篆刻书法展」算是第一个。之后陆续举办了 1994 年 4 月的「明清名家篆刻印章珍品展」和 10 月的「古旧印章印石搜珍展」等。而展销品的来源除了集古斋自己的库存外，还有一些来自本地藏家放售的东西。

2.3 罗桂祥与集古斋

罗博士其实很早已对收藏书画产生兴趣，而集古斋本来就是以经营书画为主。其时，集古斋在中环都爹利街中和行，不少前辈收藏家因办公地点都在中环，因而经常利用午饭时间走上集古斋逛逛，也藉此和同侪交流。作为敏求精舍及东方陶瓷学会会员的罗博士也不例外，成为集古斋常客。后来，集古斋开始筹办篆刻作品展，据杜女士忆述，罗博士一收到图录就会提前来观赏，他会留心于未曾买过的篆刻家作品，希望收集更多不同作品，愈多愈齐愈好。现时所知有 169 项购自集古斋的印章（附表一），除了从展览中选购展品外，更多是由杜女士从库存中挑选出来的。从单据所见，这 169 项印章中由数万元一方到十多万元一方也有，在当时而言，价格实属高档次的。而当中不少是名家之作，更有难得的珍品如明末清初书画家程邃（1605–1691）为清代鉴藏家梁清标（1620–1691）刻「蕉林鉴定」印。罗博士更曾邀请杜女士到他府上，鉴赏早前购自其他途径的印章，可见罗博士对杜女士相当信赖。而在访问中，杜女士亦提到罗博士在 1992 年以前收集的印章，极有可能是来自另一家文物店—博雅公司。

2.4 博雅与罗桂祥藏印

循着博雅公司这一方向，研究团队访问了两位篆刻界前辈邓昌成先生和禰绍灿先生，他们当年经常与博雅公司往来。据邓昌成先生所述，博雅公司全名是博雅艺术公司，位于尖沙咀加连威老道。当年，做篆刻的朋友常常于下午到那里聚集。1970 至 1980 年代，大量印章流入香港，集古斋和博雅也会销售，邓先生他们常到仓库看印章，当中有很多印章是名家所刻，懂印章的人就常来淘宝。同时，一些印人亦会在两店挂牌接受订刻印章，有客人会买下印石来请印人重刻。邓先生亦曾经刻过名家的印章，刻印前要磨掉前人的印文，所以先钤原印，以供日后欣赏学习，然后磨掉印文替客人再刻。

邓先生接触到后来成为罗博士收藏的这批印章是在 1980 年代初。他曾询问当年博雅的主事人陈树宜先生，惟他对这批印章毫无印象，说明这批印章非由博雅直接销售。个中因由得加以说明。原来，从 1980 年代初，北京荣宝斋已在香港设立销售处，并派员负责洽商工作，当时的代理是荣宝斋有名的书画鉴定专家王大山先生（1933–1993）。ⁱⁱⁱ 邓先生忆述当时博雅的经理王桂鸿先生跟他说来了一批印章，数量颇多，请邓先生在三天之内拓好每方印章，以留作纪录。邓先生以三晚的时间，一晚一批，分成三批拓印，最终拓了三套拓本。邓先生曾问王经理印章来源，他说是荣宝斋王大山先生经手的。

王大山先生早在 1979 年首次来港，与集古斋合办「金陵八家画展」，自此打开日后在港业务。至 1987 年，荣宝斋与博雅合作，正式成立荣宝斋（香港）公司，王大山成为首任经理。此前应就是荣宝斋在博雅附设销售处时期，王氏在京港两地活动，而这批印章买卖，也应在此期间发生，即是 1980 至 1987 年之间。

王大山与香港的收藏界很快建立关系，罗博士当时已是收藏界名人，也是敏求精舍和东方陶瓷学会的核心，王大山自然亦与罗博士交往。据悉这批印章就是由王大山经手带到博雅，准备卖给罗博士的。据邓先生忆述当时所见这批印章，广东印人刻的很多，也有西泠八家等。由邓昌成先生提供了总共 333 页的原石手铃本（每页一印，无边款拓，据邓先生说整批当不只此数，应有近 500 方），经仔细核对后，证实茶馆藏品中有 313 项就是当时罗博士购自于王大山的那批印章（附表二）。

由此推断，这是罗博士一次整批购入的印章。而且，据邓昌成忆述，这批印章从交到博雅至售卖给罗博士，当中经历的时间相当短促，说明这次交易很快完成。据杜女士所知，其实罗博士对印章虽有兴趣，但不能说有深入研究。何以以他这样一位精明而慎重的商人，会在未曾深入研究便购买这批印章呢？难道他不虞当中或有优劣真伪？除了他对王大山的信任之外，也许还有其他更关键的原因，令他对这批印章另眼相看，而当中包含一批李祖佑（1897–1965）^{iv} 的用印，可能就是重要线索。

2.5 李祖佑与香港印坛

据著名传记学者许礼平先生提供的数据（图 2-5），其中一份是李祖佑医生逝世之后，由联青社于 1966 年 2 月 8 日举行「李祖佑医生追思会」的刊物，当中可看到罗博士出席了追悼会，并以「挚诚良友」为题讲述李医生的事迹，显示他们二人的挚友关系。据刊物所载李氏生平事略，可知他是著名儿科医生，毕业于香港大学，再到英国深造，学成回港后，任职于政府医院。战后在香港文化界十分活跃，他与其时的中西

艺坛均有交往，^v 而且对篆刻尤其钟情，不仅富于收藏，更尝亲自操刀。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曾在 1953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1 日举办「李祖佑医生收藏图章展览」（Exhibition of Seal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Dr. Li Tsou Yiu），当时的馆长陈君葆（1898–1982）在日记讲述他出席开幕，并为展览致辞，更提及其时李氏收藏了近 1,000 方印章。^{vi} 由此可见，李祖佑医生的藏印早已闻名于时人。

1958 年举行的「港澳篆刻家作品第一次联合展览会」，是香港印坛的一次重要活动，从邓昌成先生提供当时配合展览出版的《现代篆刻合辑》，正刊有李氏作品（图 6、7）。此外，另一位参展的篆刻家易越石（1912–2007）在一方赠给李氏的印章边款上提到：「祖佑先生对金石书画造诣深湛且精篆刻，业西医者能有如此成就者，海内外仅君一人而矣。戊戌四月为余（寓）港第九年，欣逢李府盛会，集同道廿余人于一堂，商讨第一次联合展览事……」由此可见，李氏不仅是参展者之一，更热心襄助，促成此次展览。

从茶馆藏印中可以发现为数 57 方李祖佑名款用印（附表三），除了两方为自刻印和四方未知何人所刻外，其余均为 1940 年代后期在香港的印人为其镌刻，计有：简经纶（1888–1950）、罗叔重（1898–1968）、冯康侯（1901–1983）、陶寿伯（1902–1997）、张祥凝（1909–1960）、易越石（1912–2007）、许半愚（1914–1968）、高甜心（1915–？）、何筱宽（1916–？）、何少强（1917–？）、林千石（1918–1990）、方去疾（1922–2001）、白庵（生平待考，与林千石同时代）、陆祁（生平待考）和张炽良（生卒待考）等。从这些印章可见李医生与许多不同地域的印人曾有过从。

从这些印章边款，可以看到早在 1947 年（丁亥）10 月广东印人林千石已为他刻印（C1994.0338、C1994.0340），主要是林千石在 1948 年赴南洋前所作，1949 年回港后再为李氏刻印（C1994.0387）。1948 年 1 月始有冯康侯刻的印章（C1994.0274），这与另一方印（C1994.0273）应为一对，而从边款可以考证冯康侯于 1948 年已在港。张祥凝的印章，最早有年款为戊子（1948 年）。至于 1948 年到港暂居，并于 1950 年赴台湾的陶寿伯，受何少强之托，为李氏奏刀（C1994.0372）。1949 年（己丑）有广东印人何筱宽的印章（C1994.0368）；亦有上海印人高甜心的印章（C1994.0358）；另有潮汕画家许半愚的印章（C1994.0379）。1950 年有上海印人方去疾所刻之印（C1994.0409）。其他印人之作，虽未注明年月，也应是与此相约时期所制。

从上所述，大体说明了李祖佑医生的藏印，应包括了古人和时人两方面。如果陈君葆所言非虚，即其藏印在 1953 年展出时已有近千方，到他 1965 年逝世为止，期间收藏可能仍有增长。可以肯定，早在 1950 年代，李祖佑医生的藏印在友侪和同道中，应是颇具代表性的。只是篆刻收藏不是主流，未受当年收藏界所重视，而他和他的同代人都已作古，藏品更随着岁月流散，故今人所知无多，不无感慨。透过是次研究，初部重整勾勒出李祖佑医生藏印和他与早期香港印坛的关系。然而，他藏印的内容如何？这批藏印在他身后去向又如何？都是值得日后学者继续深入探究的课题。

回到这批在博雅放售的印章，当中既然包括了李祖佑医生自己的用印，很有可能其他印章也是来自李医生的原藏印，只是目前未有进一步的证据。但罗博士与李医生既然是朋友，也许罗博士早已得观过李氏的藏印，又或是从王大山处得知这批印章来历，因着罗博士对李医生的认识，可能这就是让他坚定决心迅速购入整批印章的主要原因。

3.1 茶具文物馆藏印的构成和特色

综上所述，可以整理出茶具文物馆 663 项（共 677 方）藏印的构成经过。大抵在 1980 年代前期，罗博士从王大山处购入一批为数或近 500 方的印章。从数量而言，

这批印章无疑成为了罗博士藏印的主体，迄今所能确认便有 313 项成为了茶具文物馆的收藏（实际应有更多，只是现时未有可作对照的证据）。另外，从 1992 年罗博士的捐赠计划获得确认后，他继续积极增加捐赠的数量，截至罗博士离世前，他从集古斋先后购入藏印 169 项。因此，能确定入馆前的来源的藏品计共 482 项。总括而言，茶具文物馆的藏印，是罗博士从 1980 年代至 1994 年之间所结集而成，除却王大山和集古斋这两个主要来源外，还散杂有其他来源。

从罗博士的收藏过程和藏品所见，可以归纳出三个特征：第一，他并不着眼于石质、石材，不属于时下称为国石藏家的一类；第二，他不以收藏古玺印为尚，先秦两汉不是他的目标，他主力收藏明清以来不同印人、不同风格流派的印章；第三，他不特别钟情某些流派，也不偏重某些名家，他就好像搜集标本一样，追求品类齐全。从购自集古斋的 169 项中就明显看到这种要求。同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 663 项藏印中竟然没有一方是罗博士委托印人为他所刻的印，这有别于李祖佑医生和其他篆刻藏家的惯性。

可以说，罗博士在建立这个收藏时，不是基于个人喜好，因他早已设想将这批藏印建构成博物馆收藏，所以他要求品类齐全，使之成为可供展览、研究和教育的藏品。若从这点出发，也许能进一步解释罗博士购藏王大山该批印章的另一原因，同样是基于品类齐全。所以他在捐赠了首批印章后，不单没有停止，反而积极增加捐赠藏品。由此可知，他是全情投向他一手促成的茶具文物馆收藏。

3.2 茶具文物馆对岭南印学研究的意义

是次研究的另一重点就是这批藏印对岭南印学发展的价值及重要性。这批印章囊括了 59 位（包括 4 位待考）自清代中叶至 20 世纪与广东及香港地区相关的印人（附表四），逾 180 方作品。由于不专为一家一派，它们能构成岭南印艺从兴起到广传的整个脉络。包括由粤地文化精英和入粤的浙皖名家所建构的岭南印艺三大主流，包括：

- 一. 由谢云生（1756–1823）、谢兰生（1760–1831）兄弟继承家学，开展「淳正典雅」的早期粤派，发展成后来陈澧（1810–1882）和他的「东塾印派」，由此薪火相传，下开晚清何昆玉（1828–1896）、何瑗玉（1840–？）兄弟、梁于谓（约 1844–1917），再推近代邓尔雅（1884–1954）、简经纶（1888–1950）。此派具有浓厚文人气息，深受金石学的影响，治印兼容文字、训诂学问。
- 二. 乾隆年间，由丁敬（1695–1765）等人开创的浙派，广披大江南北，道光年间由陈鸿寿（1768–1822）的弟子余曼庵（约 1797–约 1855）和师法陈鸿寿及赵之琛（1781–1852）的徐三庚（1826–1890）相继客居广东，将浙派遍播岭南。柯有榛（1814–1885）及其子柯兆良（约 1856–约 1911）、柯兆明（生卒不详）和弟子胡曼（？–1929）致力发扬浙派，复有叶期（？–1914）、杨其光（1862–

约 1925) 私淑柯氏一脉,此派重视沉厚雄奇、古拙劲削的刀意,流露个性。近代印人罗叔重(1898-1968)亦从浙派入手,演绎成独特风格。

三. 由安徽来粤,影响岭南印风,并产生出「黟山派」的黄士陵(1849-1908),将皖、浙与粤的传统参伍融通,并大量吸收古代刻铸文字,以建立自己的艺术特色。李尹桑(1882-1945)、易孺(1874-1941)、邓尔雅、简经纶、余仲嘉(1908-1942)、何秀峰(1898-1970)、张祥凝(1909-1960)、冯康侯(1901-1983)等均继承黟山流风,而能自成一家,更将此风远播四方。

由于这批藏印的丰富多样性,除了可以构成线性的历史陈述外,加上印章的边款所反映出印人之间的师承友侪关系,以及他们与其他同时代的文化人的交往,继而可以构成网状的文化脉络。以不同的关系网络建构更多主题,如创建于 1904 年的「西泠印社」、1918 年在广州建立的「濠上印学社」和 1958 年在香港举行的「港澳篆刻家作品第一次联合展览会」等,展现篆刻界如何因应不同时代文化环境的改变,与时俱进。

同样地,整批印章包括自明中叶以来的各个流派,齐集了清代皖、浙两派、清末民初上海、江浙、北京地区的印人群落。虽然数量上不足以作每家每派的独立论述,但却可以作通史式陈述,更可以作为岭南印风源流的重要印证。此外,这批藏印如能配合香港艺术馆历年来收藏的数百方不同艺术家的用印和篆刻作品,再加上香港中、青辈的书法篆刻家和历届双年展的获奖作品,便可将印学的承传延伸至当代艺术。

总括而言,是次研究不仅初步重构了茶具文物馆藏印的来源,并能从中体现罗博士结集这批藏印时的远见,以及为博物馆付出的无私奉献。此批藏品为市民大众提供一个欣赏、学习的便捷门径,为五百年来印学不同流派发展方向,提供了可鉴实物。对印学研究而言,它更是一个尚待开发的宝库。现代印学研究早已跨越一家一派的范畴,趋向更广泛的文化脉络而开拓。茶具文物馆藏印的整全和多样性,正反映其深具作进一步研究的潜力。期望公众和学艺界能珍而重之、惜而用之,不负捐赠者的美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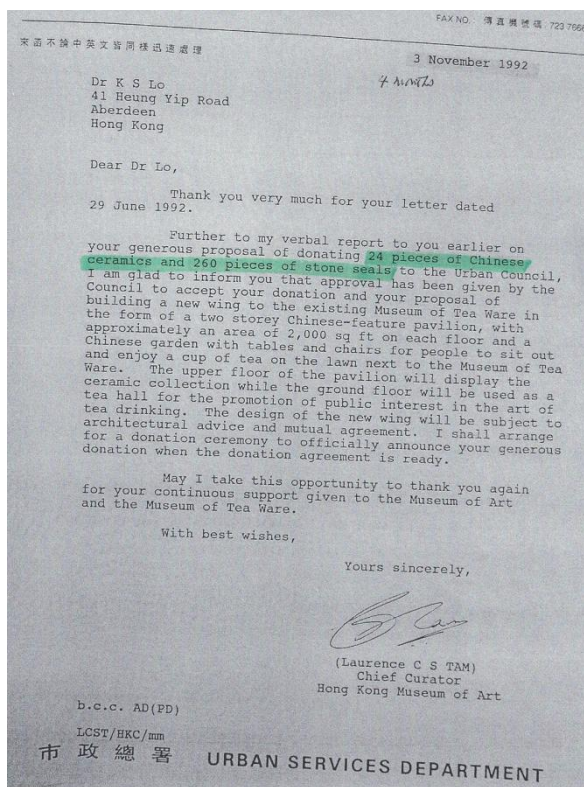


图 1. 谭志成总馆长回复罗桂祥博士市政局确认他的捐赠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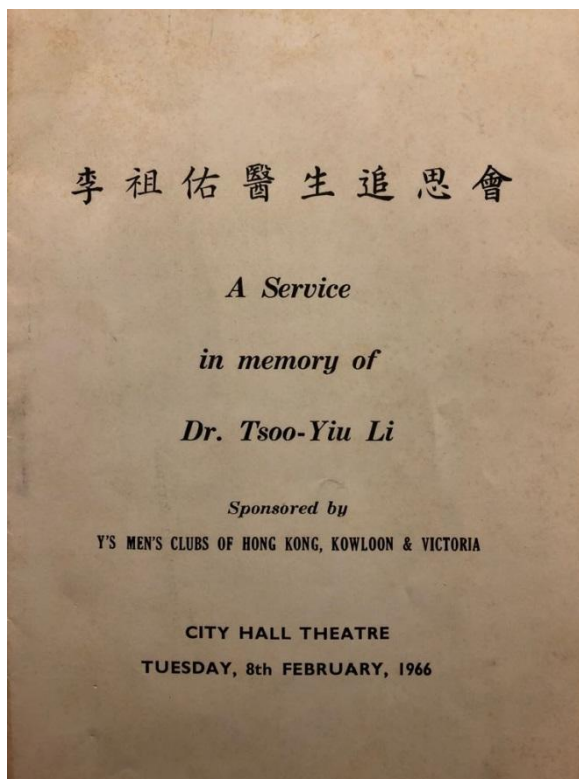


图 2. 1966 年 2 月 8 日联青社举行「李祖佑医生追思会」的刊物(许礼平先生提供)



图 3. 「李祖佑医生追思会」场刊内附李医生照片（许礼平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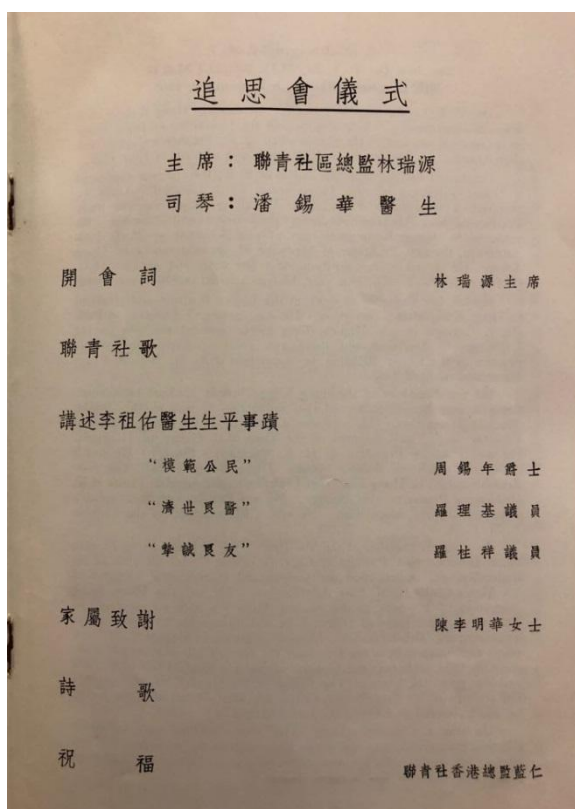


图 4. 「李祖佑医生追思会」场刊内载罗桂祥议员以「挚诚良友」为题讲述李医生生平事迹（许礼平先生提供）

李祖佑醫生生平事略

李祖佑醫生字繩武，亦作軍伍，別署隴西布衣，雲南昆明人，生於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日。早歲卒業於雲南私立第一中學及香港聖士提反書院。一九一九年入香港大學醫科，一九二四年卒業獲內外科學士學位，奉委為國家醫院駐院醫生，未幾獲選派英美德法專攻小兒科及熱帶病學，學成返港出任港大醫學院教授，一九二九年獲香港大學頒授醫學博士學位，同年與黃瑞珍女士在港結婚，旋獲上海雷德醫學研究院邀請赴滬為國人服務，數年後返港復任港大醫學院教授，續在港大任教，滿門桃李。數年後出而應世濟世，為香港傑出之小兒科醫生，垂三十年。一九四一年香港保衛戰期間，先生領導醫界同仁，不避艱險，出為受傷兵民服務，洵稱良師益友。

李醫生熱心公益，勇於服務，對本港社會貢獻至大，曾任中華醫學會會長，英國醫學會會員，皇家亞洲學會會員，東華三院副主席，保良局總理，聖士提反書生會會長，香港釋囚會永遠會員，香港小兒科專科學會發起人及首任會長，中英學會會員，香港藝術會會員，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永遠會友，國際聯青社東南亞區總監，於國際聯青運動在香港之發展，具有特殊貢獻。先是，一九三二年初，先生與同醫藥界、文藝界及工商界友好，籌組香港聯青社，並於該年五月五日正式成立，是為聯青社在港之始創。自是以後，卅餘年來，聯青社在港之各種聚會，會前不離先生之親親參與。一九五九年，先生率領港九二社友出席在東京舉行之第二屆亞洲區聯青大會。一九六一年，復以代表所歸，被舉為國際聯青社東南亞區總監，次年連任，任內曾於一九六三年四月率領港九聯青社友前往星加坡籌辦第三屆亞洲區聯青大會，達成重要決議案多項，聯青社在星洲之社務因以復振。先生對於一九五二年成立之九龍聯青社，經常與以鼓勵，並致力於港九二社間之聯絡，一九六二年七月，維多利亞聯青社成立，可謂先生一手養育扶植而成，除被該社社友推舉為永遠名譽社友外，並奉為維多利亞聯青社之父。香港聯青社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一致推舉先生為永遠名譽社友，以答謝先生對該社卓越之貢獻。先生對新舊社友，熱誠一如親人，對社務之關切，尤朝夕不忘，誠為香港區聯青社之最傑出領導人，不愧為「聯青楷模」。

除以上各端及對聯青運動之貢獻至大外，先生童年即醉心書畫篆刻，醫務之餘，喜蒐集書畫及金石，著名家印章甚多，曾於一九五三年在港大展出所藏名印，公諸同好，暇時以治印自娛，間畫墨竹、山水，數次在香港美術會展出，甚獲好評，藝林珍之。

李醫生古道熱腸，濟貧助學，義不後人，三十年服務醫界活人無算，迨於一九六五年三月底榮休，意欲以餘閒歲月從事英文譯述中國金石篆刻，詎綱要方成，舊疾復發，遂告不治，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寓所逝世，緬懷風範，易勝悼念。

圖 5. 「李祖佑醫生追思會」場刊內載李醫生生平事略（許禮平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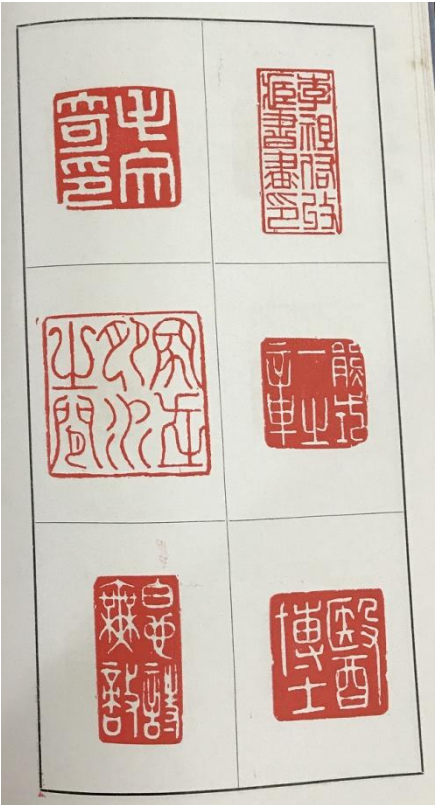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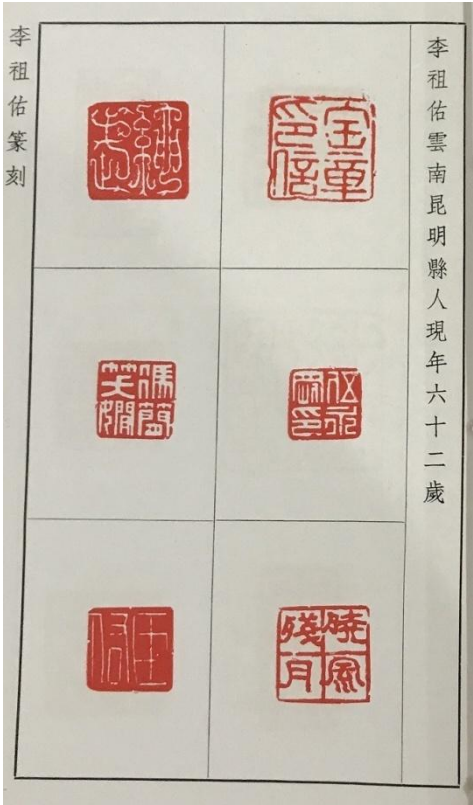


圖 6、7. 1958 年《現代篆刻合輯》內刊載李祖佑的篆刻作品（鄧昌成先生提供）

注释

ⁱ 潘静安（1916–2001）是一位奇人，广东番禺（一说南海）人，父亲是私塾校长。潘氏早岁已在香港随罗落花问学，尤好篆刻。1930年代赴上海广结交游，与易大厂、叶恭绰等名士过从。抗战期间回港，加入了廖承志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工作。香港沦陷后，他参与抢救滞留香港的军政及文化名人回国。他曾是中共中央调查部在港的负责人，并在香港中国银行任副总稽核，年轻时曾在上海跟易大厂学习篆刻，后来在银行界工作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地位。1970年代末，他准备退休返回北京，但担心自己的技艺和爱好会失传，于是从集古斋和中华书局中组织一群青年职工跟他学习篆刻。关于潘静安的生平事迹可以参见许礼平：《旧日风云二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页1–10、11–24、25–40。书中的首三篇文章〈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记香江潜龙潘静安〉、〈三教九流佞鬼神，五湖四海傲王侯—再记香江潜龙潘静安〉及〈潘静安二三事〉，即详述了潘氏一生行事为人，其中与艺事有关的内容，主要载于〈潘静安二三事〉，当中潘氏开班授徒、与杜女士的师徒情谊亦见文中。

ⁱⁱ 编者按：小林斗龠（1916–2007）、青山杉雨（1912–1993）等日本书道家早在20世纪初期，已在上海拜访吴昌硕（1844–1927）、王一亭（1867–1938）等名家。

ⁱⁱⁱ 王大山（1933–1993），原名王奇珊，祖籍衡水桃城区南沼村，生于北京。他是荣宝斋书画鉴定家，也是当年北京荣宝斋派驻香港代理人。早在1979年，王大山首次来港，与集古斋合办「金陵八家画展」，打开日后在港业务。至1987年，荣宝斋与香港博雅艺术公司合作组建了香港荣宝斋，据王大山的儿子王卫谈到，自己的父亲就是荣宝斋香港分店的首任经理。王卫的访问，见陈奕名、陈博：〈【香港荣宝斋观察】荣宝斋，香港再出发〉，雅昌艺术网，<http://news.artron.net/20140402/n587411.html>，检索日期：2018年5月9日。

^{iv} 李祖佑（1897–1968），云南昆明人，字绳武，号筹伍。书斋名号为乐暇时斋。香港大学医学院外科硕士。继而到英国入伦敦大学、苏格兰格拉斯大学等校专攻小儿科及热带病学，返港后任香港大学教授，1929年获港大医学博士学位。他喜好文化艺术，又擅篆刻，悬壶之余，经常参与文艺活动，与共时中西画坛均有交往，亦好收藏，尤以所藏粤港两地名家书画为让人赞叹。

^v 李祖佑曾为画家余本（1905–1995）的展览在1953年11月13日的《星岛日报》发表〈余本画展观后〉。他又曾为画家陈福善（1904–1995）题署《国画概论》一书。

^{vi} 编者按：陈君葆获林仰山邀请出席李祖佑于冯平山图书馆举行的印章展览，并于展览致辞。根据陈氏的日记，展览开幕时间为1953年2月27日下午。见谢荣滚主编：《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三·1950–56》（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4），页225。